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 美国的中国形象 (1931-1949)

[美] 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智芹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 美国的中国形象 (1931-1949)

[美] 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智芹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 中国形象:1931~1949/(美) 杰斯普森  
(Jespersen, T. C.) 著;姜智芹译.--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0.6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286-4

I. ①美… II. ①杰… ②姜… III. ①中美关系-国  
际关系史-研究-1931~1949 ②国家-形象-研究-中国  
-1931~1949 IV. ①D829.712 ②D693.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511 号

---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by T. Christopher Jesperse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8-383

---

书 名	美国的 中国形象(1931—1949)
著 者	[美] 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译 者	姜智芹
责任编辑	戴宁宁
装帧设计	武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网 址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页4
字 数	259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286-4
定 价	2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 译者的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是一部深受学界关注、广为征引的著作。该书作者 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是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专家,现为美国北佐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艺术与文学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杰斯普森学养深厚,1991年获罗格斯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任教,2001年到北佐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任教至今。

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学术成就斐然,除了这本《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外,他还出版了《乔治·凯南访谈》,与大卫·舒密兹(David F. Schmitz)合编了《美国世纪的设计师: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个人作用、外交理念和机制》等;发表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美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论文,如《西方影响与中国形象:关注中国改变中国的不懈努力》、《中国和越战(1950—1975)》。杰斯普森曾多次参加萨尔茨堡研讨会(Salzburg Seminar),是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研究员,不断在美国各地发表学术演讲,就中美关系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杰斯普森上大学时就对美国的外交关系感兴趣,工作后也一直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他的这本书选择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时期——1931—1949年作为研究重点。这一时期美国旨在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中美贸易日益增多,传教士传来的消息也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正向20世纪的美国靠拢。另外,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对中国的热情和责任感因日本侵华而被更显著地激发起来的时期。出于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需要,中美之间结成战略联盟,同舟共济,共同度过了光荣的战争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达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巅峰。该书1996年出版后受到好评,《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等杂志刊登书评,认为“杰斯普森令人佩服地证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正视那些曾经支配美国人认知中国的形象”,赞赏“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论述透彻、明晰,是从文化角度,概念化地诠释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学作品的有力补充”。时至今日,该书已成为海内外探索美国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考书,不时见诸论文和著作的参考文献当中。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除前言和绪论外,共有九章。前言从乔治·布什总统对中国的好感引出本书探讨的核心人物亨利·卢斯,并道出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为了解开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深层动因,为了了解中美邦交正常化的途径,同时也为了认识中美关系目前的发展,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看美国对中国曾经有过怎样正面的看法。”绪论追溯了1890—1931年美国传教士所创造的中国形象,指出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建立在“经济与宗教合作”这两种强大而又互相矛盾的冲动上。

本书正文部分以时间为序,大致阐述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亨利·卢斯的《时代》、《财富》和《生活》三大杂志对蒋介石政府及抗日战争初期战况的报道;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成立及1941年为中国抗日战争筹款的情况;美国参加二战前联合援华会和时代公司对中国的宣传;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43年轰动美国朝野的访问;1944年史迪威

被召回后美国媒体对蒋介石政府内幕的揭露；二战临近尾声、盟军胜局已定时美国对国民党的乐观看法；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占上风后美国的悲观论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媒体对“丢失中国”谁之罪的问责。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1931—1949年美国的对中国形象是一种不顾中国实际、由传教士激情和卢斯媒体误导的幻象，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幻象之上。卢斯媒体和联合援华会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美化，导致美国政府制定了支持、援助蒋介石的对华政策。而在二战后，当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形同媒体宣传的大相径庭时，又引起美国人激烈的情绪反弹，导致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的冷战政策以及对越战争。

杰斯普森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人的中国形象不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实际的了解，而是由于他们只希望接受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的中国形象。20世纪初期，强盛起来的美国形成一种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认为美国成功的经验值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仿效，这导致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恩抚主义”，即美国应像慈父那样帮助、指导其他孩子般未成熟的国家，使它们成为像美国一样具有基督道德、政治民主、工业现代化的国家。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一个理想的“孩子”：它有亿万不信基督教的人民等待救赎；它正处在一场文化变革之中，给美国人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从20世纪一开始，美国人就把中国作为实现自己民族抱负的试验场，用“恩抚主义”的原则，在传教士收获灵魂同时也收获财富的观念支配下，建立起浪漫化的中国形象。

杰斯普森指出，美国这种浪漫化的中国形象和媒体大王亨利·卢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卢斯是生于青岛的传教士之子，对中国和美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将中国美国化是他的“美国世纪”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自己影响巨大的新

闻媒体中,按照自己的愿望报道中国,用精心挑选的中国事件向美国公众传达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中国形象,同时影响他付出巨大心血和财力的联合援华会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蒋介石作为中国名义上领袖的政治背景和他与宋美龄结婚后加入卫理公会的宗教背景,让卢斯选定他和他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正面宣传和倾力支持的对象,在宣传中国时坚持以下三点:强调中美的相似性和中美两国息息相关、情同手足的关系;给蒋介石以异乎寻常的友好对待,多次让他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对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采取同情和为之辩护的态度。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其《大地》三部曲中塑造了中国农民王龙与阿兰夫妇顽强地与天灾人祸作斗争、最终勤劳致富的故事,这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农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一洋溢着美国精神的中国故事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使之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随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把中美关系人格化了。她的中国面孔和美国心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巨大价值和美国传教士的文化理想。杰斯普森说美国人认为她把美国的价值观带到中国,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她还使蒋介石皈依耶稣基督,为亿万迷途的中国羔羊引来上帝之光。因此,她 1942—1943 年访美时受到极高的礼遇,被邀请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轰动了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的数万名美国民众,将卢斯和赛珍珠营造的中国形象推向光明的顶点。

但正如杰斯普森正确指出的,20 世纪上半期美国基于传教士激情、由鲁斯媒体误导、赛珍珠小说强化、再由宋美龄推向高潮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人信息接受和对华态度的卢斯媒体帝国,从不报道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它赞扬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和他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却只字不提蒋介石内部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它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标榜成中国

现代化的推动者，而对赢得中国广大农民支持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却横加歪曲；它使中国离卢斯的理想和信念越来越近，而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

这种打着新闻真实的幌子创造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形象学专家巴柔指出：“‘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卢斯媒体打造的追求民主、信仰基督、乐意步美国后尘的中国形象，是其“美国世纪”理想的反映，而这一理想又契合了美国领袖和民众内心深处的美国“例外论”思想。卢斯认为在美国人发挥巨大作用的“美国世纪”里，美国是新的中央帝国，是自由的灯塔、平等的旗帜；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有着给予比接受更荣耀的美德。因此，美国要作为一个仁慈的霸权，以强烈的责任感，将自己政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其他国家分享。而“美国世纪”的实现，有赖于中国走美国化的道路。对卢斯和众多美国人来说，他们不需要一个实际的中国，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他们需要、实现他们理想和抱负的中国。因而，中国形象的背后其实是美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美国人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屏幕上，放映的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不过，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这种不顾中国实际的中国形象在当时对中国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来自卢斯媒体和赛珍珠小说里的中国形象使美国人日渐痛恨日本人，相反越来越同情甚至敬佩中国人，以至于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舆论强烈呼吁援助中国。罗斯福政府由中日战争初期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到明确表示制裁日本，帮助中国，最终在珍珠港事件后和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派出志愿航空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另外，宋美龄访美所激起的同情中国的浪潮使得美国朝野一致决定要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废除了实施60年之久的污辱性《排华法案》。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用民意测验数据来展现美国媒体制造的中国形象在美国公众中所凝聚起的舆论力量,提供了一个从文化阐释的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优秀范例。本书提供了许多新颖的材料,既有已公开出版、发表的书籍、论文,也有大量珍贵的档案史料。比如对卢斯的三大杂志、联合援华会、宋美龄、传教士弗兰克·普里斯的史料挖掘和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本书有诸多优点,但它毕竟出自美国人之手,是以美国人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的问题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倾向性,这是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 致 谢

这本书是一个人中途从大学退学能发生什么的一个例子。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读书时,由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在三年级上学期结束后退了学。幸运的是,退学之前我选修了米歇尔·亨特教授的“美国对外关系”课程。虽然亨特教授和我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确实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参阅他的著作。当然,我丝毫没有让他对这本书承担任何责任的意思。

退学之后,我很快就发现我并不想一辈子在餐馆里打工或在酒吧里当侍应生,因此便很容易做出重新回到大学读书的决定。我来自新泽西州,所以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本州的罗格斯大学,这主要是因为我是该州居民,享受一定的学费优惠,能负担得起这儿的学费。就在罗格斯大学,我的人生开始转变。1985年春季学期,我注册选修了“美国和越南”这门课,它从两方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教授同意下一学年指导我做毕业论文,并且后来让我跟他读硕士。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1986年秋在历史系的一次见面会上发生的。当时,一位研究生走进我,试探性地问:“你不是林顿·约翰逊吗?”是的,我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美国和越南”这门课的课堂练习中扮演过约翰逊。这位同学的简单

问话开启了我真正奇妙的学术生涯。

在做这项研究的十年当中,我得到了很多人、很多机构的大力帮助。罗格斯大学的理查德·史莱特基金会以及乔治·马歇尔基金会为我外出查找资料提供了经费资助,我查找资料的档案馆工作人员始终鼎力相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已从普林斯顿大学希利·G·穆德手稿图书馆退休的吉恩·霍利迪,她的满腔热情和渊博学识让我在那儿的资料查找工作充满了乐趣。我还要特别感谢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伦德·斯马雷和琼·达菲,她们给我提供了珍贵的视频资料,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提供经费让我复制了这些影像资料。这本书中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在《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上发表过(1992年秋季刊)。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罗格斯大学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同事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是:乔纳森·纳舍尔、托伦·威利斯、罗伊·多明尼哥以及乔治·萨乔万尼。约翰·罗西古道热肠,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出力最多的。马克·怀特才华横溢,不仅通读了书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在研究中给予我很多帮助。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的沃伦·金博尔是本书的编辑,他不仅个性豪爽直率,而且见解犀利独到。当我把部分章节的初稿在两次大会上宣读时,戴维逊学院的拉尔夫·莱弗林和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鲍勃·舒尔茨辛格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做了三年兼职助理教授,从许多方面来讲,我很不愿意离开那儿,因为在那儿我结识了众多可爱的朋友。我的同事凯西·莫里西、帕特里克·米勒对书稿提出了建议,吉姆·密尔沃德在中国历史和中文名字方面出了很多有用的主意。艾立森·富特雷尔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而且还有歌唱天赋,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历史系的才艺表演中首选了吉他弹唱。约翰·克鲁克伯格对戴尔·卡耐基的深入研究对我帮助很大,他的评论同样富有见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从和迈克尔·沙勒的相识相伴中受益良多,他通读了整个初稿以及部分

修改稿,不仅在专业上提出指导性意见,还在生活中给以细心照顾,更不用说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山间、沙漠做徒步旅行时,他总是背着装满孩子东西的沉重背包。我的儿子亚历山大无疑非常喜欢这类旅行,他骑在我的脖子上,抓着我的头发欣赏沿途的风景。

除了以上这些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直接帮助的人,我还要感谢以下三个人:一个是我的妈妈琼,琼善良、随和,是亚历山大的好祖母。另外两个要感谢的是汤姆和伊娃·福克斯,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会给予及时的帮助,特别是在我刚刚搬到亚利桑那州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给了我很大帮助,令我感激不尽。

我还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卡姆普梅尔,他本人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很关心我的研究,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书稿,提出富有洞见的评论,有时还亲自下厨,让我一起分享他烹制的佳肴。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芭芭拉·詹姆斯以及约翰·费奈隆积极帮助我了解有关出版的一些程序,谨致谢忱。我要特别感谢雪莉·泰勒,她不仅挑出了我语言表述的不当,还指出了几处史料方面的错误。

关于汉语名字需要说明的是,我以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为范例,也就是说,除了个别地方以外,我都是用的汉语拼音。蒋介石的汉语拼音我用的是广东话中的“Chiang Kai-shek”,而非“Jiang Jieshi”,主要是因为引用的很多资料中用的都是“Chiang Kai-shek”。广州在20世纪30年代是“Canton”,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变成“Guangzhou”,显示出对这个城市称谓的变化。与此相仿,谈论现代的北京时用的是“Beijing”,而涉及历史上的北京时则使用“Peking”或“Peiping”。引文中使用原文中的拼音形式,其他地方用汉语拼音。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三个人,没有他们我的这项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完成,至少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迈克尔·艾达斯、劳埃德·C.加德纳和特丽莎。迈克尔·艾达斯不论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都是一个



典范,当然更是一个要好的朋友。我在罗格斯大学读硕士学位时,他在很多关键的地方指导了我的研究,并一直对我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提出建议。

如果我退学后一直在餐馆打工,没有在1985年春天选修劳埃德·C.加德纳的“美国和越南”这门课的话,我真不知道我现在的人生航船会驶向何方。加德纳现在是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历史讲座教授<sup>①</sup>,作为导师、学者和教师,他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爱护学生,尊重学生,放手让他们选择感兴趣的历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他的风范、指点和友谊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本书是一个特定时期在两个地方——新泽西与亚利桑那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从一开始我就和一个非比寻常、非同一般的人同甘共苦。这本书缘起于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朝着我们两个谁都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现在的样子。言不能尽,本书献给特丽莎,纪念我们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和未来的美好日子。

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均由作者负责,如蒙指出,我会重新表达我的谢意。

T. C. J

---

<sup>①</sup> 在英美,十分杰出的教授可升为冠以人名的讲座教授。此处是以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命名的讲座教授,他们在历史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译者注